



抗日义勇军 与抗日救亡运动

主编◎解学诗
副主编◎李娜 王玉芹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抗日义勇军 与抗日救亡运动

主编◎解学诗

副主编◎李娜 王玉芹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抗日义勇军与抗日救亡运动/解学诗主编.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3

ISBN 978 - 7 - 5097 - 8707 - 6

I. ①抗… II. ①解… III. ①东北抗日义勇军 - 史料 IV. ①K264.3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18100 号

抗日义勇军与抗日救亡运动

主 编 / 解学诗

副 主 编 / 李 娜 王玉芹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宋月华 吴 超

责任编辑 / 赵 晨 周志宽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人文分社(010)59367215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35.75 字 数: 638 千字

版 次 /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8707 - 6

定 价 / 16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言

本书所述原本是九一八事变 80 周年纪念选题，因故未能及时完成。选此课题主要想法是：（1）多年来，笔者通过收集、整理史料工作，掌握一些档案文献，觉得如有机会应该将其运用于抗日义勇军问题的研究，看看对研究能否起到添砖加瓦的作用；（2）抗日义勇军历史问题是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课题，近些年已有不少著述问世，对其评价大多中肯、正确，但似乎仍有一些问题，需要深入探讨，进一步取得共识。

在理论上，本书自然不是理论创新工作，所述多为旧事，并无新的发掘与发现，而是努力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力求进行历史主义分析，不以今日之标准要求昨日之事物。在方法上，注意综合分析和总体把握，将抗日义勇军问题尽量放进中国抗日战争和抗日救亡的历史洪流中，一并剖析与认识，以期明示抗日义勇军在抗日战争历史中的本质、地位与作用，不使其自外于中国抗日战争史全局。基于此，本书理所当然地从整体上肯定抗日义勇军的历史意义，弘扬由义勇军军歌即如今的国歌所传递出来的，实际是由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升华的“团结奋斗”的伟大民族精神。本书并不否认义勇军的缺点与问题，但它们不是决定义勇军本质与主体的关键因素。本书也不对义勇军的个人与个案问题进行专门论证。因为笔者水平与能力有限，所掌握的史料也有限，所述人与事难免挂一漏万。

本书框架、结构的特点是，课题研究成果和档案文献展示同时并重，这样做无非表示重视文献史料。课题研究成果，不管质量高低都是一家之言，而重要档案文献则可供人们长期研究和玩味，两者的研读和读后感受是不能互相取代的。

辽宁的同行是抗日义勇军问题研究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他们的《东北

抗日义勇军史》《东北抗日义勇军人物志》《东北抗日救亡人物传》等，都是本课题研究的基本参考文献，本书多所依据和引用。同样，戴茂林、邓守静所著《八年抗战中的东北救亡总会》和张德良、周毅主编的《东北军史》，也是保证笔者研究水准的基本文献，没有他们的研究工作，笔者的努力不可想象，因此在这里特向使笔者获得教益的辽宁同行致以衷心的感谢。

总之，归根结底，本书所能展示出的，只有角度、方法和若干观点，是否必要、妥当和具有意义，有待于读者和朋友的不吝批评。

目 录

上编 课题研究

前言 关于抗日战争开始和发展道路问题·····	/ 3
第一章 东北各路抗日义勇军·····	/ 7
一 东北军的不抵抗与抵抗·····	/ 7
二 江桥抗战与黑省抗日军·····	/ 14
三 吉林自卫军捍卫大片国土·····	/ 26
四 辽宁义勇军烽烟四起·····	/ 35
五 抗日义勇军的历史意义·····	/ 44
第二章 从义勇军到抗日联军·····	/ 52
一 武装抗日方式转换·····	/ 52
二 坚持原地抗日的义勇军各部·····	/ 58
三 红军游击队与义勇军分合立废·····	/ 66
四 抗日联军建立·····	/ 74
五 历史的发展与升华·····	/ 82
第三章 抗日救亡运动与义勇军精神·····	/ 84
一 抗日救亡论推出与义勇军被毁·····	/ 84
二 抗日救亡运动向纵深发展·····	/ 95

三	华北事变与“一二·九”运动	/ 101
四	西北抗日救亡运动的崛起与西安事变	/ 106
第四章	抗战两条路线，东北军民坚持奋斗牺牲	/ 116
一	国民党的抗战建国与独裁反共	/ 116
二	战时抗日救亡运动特点	/ 127
三	东北救亡总会及其业绩	/ 135
四	抗联、东北军、义勇军老将抗战到底	/ 142
结语	团结奋斗的民族精神世代传承	/ 154

下编 文献辑录

前言	抗日义勇军档案文书的珍稀性	/ 157
第一章	黑龙江军及民众救国军	/ 161
一	黑龙江省抗日战斗详报（1934.4）	/ 161
二	马占山抗日文献	/ 210
三	苏炳文起义与民众救国军	/ 331
第二章	吉林自卫军	/ 338
一	吉林自卫军抗日纪实	/ 338
二	吉林军哈尔滨保卫战	/ 352
三	李杜等抗战报告	/ 376
第三章	辽宁义勇军	/ 384
一	辽宁抗日军在锦州沦陷前后	/ 384
二	唐聚五辽宁民众自卫军	/ 392
三	辽宁三角地区抗日义勇军	/ 423
第四章	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广泛开展	/ 429
一	抗日武装的消长变化	/ 429
二	抗日武装活动情况	/ 445
三	抗日救国团体	/ 470
四	东边道与三角地区的敌我斗争	/ 475

第五章 日伪对抗日义勇军的观点·····	/ 500
一 战犯笔述·····	/ 500
二 伪满警察史记述·····	/ 515
附 录·····	/ 523
一 中国共产党关于东北抗日武装斗争文件·····	/ 523
二 九一八事变前后中国东北军与日本关东军状况调查·····	/ 547

上
编

课
题
研
究

前言 关于抗日战争开始和发展道路问题

中国抗日战争始于何时？这本来是一个毋庸置疑的明白问题，可是近年来在日益深入的抗日战争史研究中，却成为一项不大的争议。部分学者主张中国的抗日战争始于1937年的七七事变，从此到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的中国对日作战是抗日战争，其前包括东北军民的抗日武装斗争，不属于中国抗日战争历史范畴。经过研讨，目前一般的认识是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的对日战争是中国局部（指东北）抗日战争的开始；而以1937年的七七事变为起点的对日反侵略作战，是中国全面抗日战争之始。^①从抗日武装斗争发生发展的地理区位来看，特别是联系中共党史来观察，这样论断合乎实际，是正确的。其实，关于中国抗日战争开始和发展问题，毛泽东同志早在抗日战争正在进行时就做了明确的阐述：“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在曲折的道路上发展起来的。这个战争，还是在一九三一年就开始了。”^②如果认为毛泽东同志的论断正确的话，无疑1931年九一八事变就是中国抗日战争之始（当然也是日本侵华战争之始）；问题在于，抗日战争发展的“曲折的道路”，内涵是什么？也许这才是认识抗日战争发生发展历程的关键所在。历史表明：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侵华战争以来，中国人民既要同日寇进行救国于危亡的空前惨烈的反侵略战争，

① 人民出版社2011年9月出版的马克思理论研究和建设重点工程项目成果之中国抗日战争史编写组编写的《中国抗日战争史》，就是把九一八事变起的对日武装反侵略作战，说成中国局部抗战的开始，而后局部抗战持续发展，直到察哈尔抗战后的福建事变，即1934年1月福建政府解体，才结束。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034页。

又必须对国民党政府采取的对日屈服，即妥协、不抵抗政策，以及其妄图建立专制独裁统治的所谓“抗日建国”方针进行尖锐复杂斗争。

堪称中国抗日战争第一役的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抗敌斗争，就是广大东北军民面对日军疯狂进攻和蒋介石、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为挽救国家民族危亡所能做的唯一选择。就像马占山当时所言：“与其丧失国土，委诸父老于不顾，毋宁牺牲一切，奋斗到底，如蒙天佑，或可保持一时，而获最后之侥幸。”^① 所以马占山敢于“以一隅之兵力”“抵日人一国之大军”。当时奉命实行对日不抵抗的是东北军官兵，进行“不抵抗”之抵抗的也是东北军官兵。正如台湾著名历史学家郭廷以所指出的“东北正规军虽奉命对日不加抵抗，自动抵抗的仍旧不少”^②。而且，东北军官兵至少在义勇军发展的初始阶段，处于主力地位，发挥主导作用。除东北军官兵外，义勇军的构成成分，还有警政人员、民团、农工商学以及大刀会、红枪会等民间组织及绿林武装势力。他们揭竿而起，风起云涌，自称自卫军、救国军，采取自发分散的办法和灵活游击的战术抗击和应对侵略者。特别是在1932年初春，即日军占领了东北三省一区^③的主要城镇及主要铁路交通线，打造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从而证明了日本将永远霸据“满蒙”并征服全中国的企图后，抗日义勇军运动出现新的高潮，并获得全国人民和抗日救国团体的支持和声援，一时间，抗日义勇军总规模达数十万人^④，致使日本侵略军陷入中国抗日义勇军的汪洋大海之中。先是（4~7月）马占山的黑龙江军及东北抗日救国军和李杜、丁超的吉林自卫军，把黑吉两省作为抗敌主要战场，甚而使敌人占领长春、哈尔滨时受到严重打击；继而（特别是7、8月间）唐聚五的辽宁民众自卫军和战斗在南满“三角地区”的邓铁梅、刘景文、李春润等义勇军各部，又掀起攻打沈阳、抚顺、辽阳、鞍山、营口等各大城镇和破袭南满铁路、奉山铁路、沈海铁路等的斗争高潮；随后（主要是9月以后）护路军苏炳文、张殿九两旅宣布起义，建立民众救国军，并与摆脱日军重兵围剿的马占山联手进攻黑龙江省省会齐齐哈尔；紧接着，先后给日军以重创的李杜、丁超的吉林自卫军东进攻克佳木斯，与其相呼应的在中东铁路东部线活动的王德林国民救国军也取得了令中外瞩

① 《马占山致北京张学良及各界的电报》（1931年11月6日），《黑龙江省抗日战斗详报》，1934年4月，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复印件，第9页。

②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3，第633页。

③ 三省一区，即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和以哈尔滨为中心的沿中东铁路的东省特别区。

④ 东北抗日义勇军总兵力，系动态数字，一般为估计值，故说法不一。多者称50万人以上，少者称20万人以上。一般认为是30余万人，如敌伪资料就是如此。

目的发展和对敌斗争的胜利。对此，“暴日纵极凶顽，亦必疲于奔命”^①。1932年，在关东军基本实现了对东三省的武装占领和完成伪满傀儡政权打造的情况下，竟然进行了九一八事变以来最大规模的增兵，以致可以利用五六个师团的重兵^②和驱使大量日伪警力^③，发动极力镇压与“围剿”义勇军的武力活动。1932年夏季北满的空前水灾^④已经给义勇军造成无法言状的极大困难；时届严冬，本来就“兵单饷绌，器窳装敝”的义勇军，在关东军大肆杀伐下，更加“饷弹两缺，衣食无着”，甚而不得不“披搭被褥，与敌对抗”，最后“物罄粮殚，无以为守”^⑤。及至1933年2月日军进攻热河时，奋斗达一年半之久的抗日义勇军被迫转进和退散，抗日武装斗争转入低潮，但这绝非义勇军的溃败和被消灭，不管是转移外地者，还是坚持在本地者，都是“在极端艰苦之下，继续奋斗不懈”^⑥。

日军进攻热河时，一分为三的义勇军，多数还是留在东北各地坚持艰苦卓绝的抗日武装斗争。^⑦就连日伪方面都不得不承认，抗日义勇军“在量上虽然显著减少”，但“在质的方面，有了显著的提高”，亦即“抗日部队数量的减少绝不意味着满洲的中国人民抗日运动的弱化”^⑧。他们“由大股变成小股，从平地遁往山间僻地”，“思想越来越激进，行动也就更加坚决”。特别是以不断袭击县城和火车的战斗方式打击敌人。虽然日本侵略者也改变了“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运动战术，从1933年6月起实行分散配置，全线出击，武力“围剿”与政治镇压相结合，大规模地进行所谓

① 《马占山致电北京张学良及中央》（1932年5月9日），《黑龙江省抗日战斗详报》，1934年4月，第23页。

② 据1932年7月1日北平绥靖公署参谋处《九一八以来日军在东北行动概要》载，当时在中国东北打杀抗日义勇军的日军部队有独立守备队、第二师团、第二十师团及第三十九混成旅团、第八师团及第四混成旅团、第三十八混成旅团、第十师团、第十四师团、骑兵第一旅团。此外，关东军进攻热河前，第六师团被编入关东军。而当时的日本常备师团，总共才有17个。

③ 1933年，伪满洲国警察共为10.1万人，警察队即武装警察部队3.6万人，占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

④ 1932年7~8月的北满水灾，受灾面积与日本九州面积相当，哈尔滨一带受灾难民即达36万人。义勇军活动的松花江下游受灾尤为严重。

⑤ 《李杜、丁超代表王子耀、刘丕光致国民政府呈文》（1933年2月24日），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原件复印件。

⑥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第634页。

⑦ 吉林省自卫军或称“吉林自卫军”，包括原吉林省正规军和新建的救国军，1932年发展到10多万人。1933年初，退入苏联后经新疆归国的共18批，8000余人，坚持在原地继续武装斗争的“尚有七万之众”。

⑧ [日] 古海忠之等：《日本帝国主义中国侵略史》（日文），未刊手稿，第382~386页。

“匪民分离”的“集家”等工作，但义勇军各部依然持续斗争，取得一系列胜利，并逐步实现了抗日战线的联合，掀起抗日武装斗争的新高潮。^① 首先，是经过前一阶段铁血战斗的洗礼，涌现出一批像王凤阁那样信誓“枪不离人，人不离乡”的思想坚定的义勇军领导者，他们掌握了相当高超的对敌斗争战术；其次，反对日伪统治掠夺（如依兰土龙山农民暴动和驼腰岭金矿工人起义）的工农知识分子相继参加抗日斗争行列，使义勇军成分有了改变，素质有了提升；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是中国共产党的红色抗日游击战争，特别是他们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对义勇军的斗争思想、行动甚至组织形式产生的深刻影响。不过，九一八事变后的初期，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游击队力量有限，并受左倾思想影响，虽然在1934年就建立了东北人民革命军，并将其提升为战时可以联合行动的抗日同盟军，但是只有在1936年初《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发表后，党所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军以及各路义勇军等抗日部队，才接连改编为抗日联军，成为政治目标和斗争纲领明确的抗日武装集团，促进抗日战争的发展。

因此，有著作将九一八事变以来的6年东北人民的斗争，说成是“一部义勇军斗争史”^②，不无道理。正是这6年来的东北人民抗日武装斗争，包括义勇军的抗日武装斗争，红军游击队的抗日武装斗争，以及两者协同的抗日武装斗争，不仅牵制、打击了敌人，扰乱了敌人的侵华计划，而且以抗战的实践，与日益高涨的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相呼应相配合，揭露敌伪，教育人民，使国民党营垒发生变化，以致“逼蒋”走上抗日战争的道路，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在这期间建立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中国人民开始了全面的抗日战争。

① 据日伪统计，1932~1937年东北抗日部队共出动131423次，抗日武装人员共出动21058011人次，按年计算，其间年均出动人次，从377万人次，增加到1035万人次，后者是前者近3倍〔吉林省公安厅公安史研究室、东北沦陷十四年史吉林编写组编译（以下省略）《满洲国警察史》，1989，第321页〕。

② 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编（以下省略）《从“九一八”到“七七”国民党的投降政策与人民的抗战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第151~152页。

第一章 东北各路抗日义勇军

一 东北军的不抵抗与抵抗

1. 蒋、张不抵抗政策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恣意侵略，东三省迅速沦丧，就中国而言，其主要原因，既有实力问题，也有政策错误。众所周知，面对日军的疯狂武装侵略，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推行的却是不抵抗政策，而守土有责的东北军最高统帅张学良又忠实地执行了这一政策。蒋、张都把日本侵略者看得过于强大，低估了中国人民抗敌的信心与力量，心存恐惧，他们把希望寄托于国际社会——国际联盟的干涉，以遏制日本，迫使其有所收敛。不过，蒋、张立场不同，着眼各异，因而在不抵抗政策的推行上日益显现差异乃至产生矛盾。

1931年7月，西北军阀石友三受粤系及日方策动，在河南发动武装叛乱。之后，中国北方又发生了漫延10省、灾民多达5000万的大水灾。凡此种种，对国民党政府的内外决策不无影响，但是，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归根结底，是出自他的“安内攘外”论。而所谓“安内”虽有压制反蒋粤系的考虑，但主要的是企图消灭中国共产党。1932年2月，集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和陆海空军总司令于一身的蒋介石，因所谓“约法问题”^①，

^① 中原大战后，蒋介石积极筹备召开国民会议制定《训政暑期约法》，剥夺反蒋派势力，实行蒋的独裁统治。1930年11月的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决定1931年5月5日召开国民会议。但蒋介石与胡汉民关于约法问题的争执日烈。蒋派人劝胡“休养”未遂后，乃于1931年2月18日将胡诱捕，软禁于南京郊区汤山，声称胡“引咎辞职”，改选了立法院院长。

软禁了国民党元老和立法院院长胡汉民，从而导致宁粤分裂、粤系国民政府成立和蒋介石受弹劾而一度下野。^①与此同时，由于国民党军两次江西苏区大“围剿”均遭失败，蒋介石遂从1931年7月1日起，亲率30万大军对江西苏区实行第三次大“围剿”，并通电声称：“不先消灭赤匪”，“则不能御侮”；“不先削粤逆”，“则不能攘外”。^②1931年11月，国民党四大召开，同月30日蒋介石在讲话中又把“攘外应先安内”改为“攘外必先安内”。^③这就是外国学者所说的蒋介石把“九一八时的不抵抗政策后来逐步发展为‘安内攘外’论”。^④

可是，继承张作霖出任东北边防军总司令的张学良，其不抵抗政策的着眼点却是日本侵略者的野心和强大。回溯1928年他不顾日本阻挠，毅然易帜归从国民政府便可知，其主要动机就是谋求全国合力抵抗日本的侵略。这已成为他的一贯思想。1931年4月，张学良升任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但他自同年5月28日起，就因身患伤寒病住进北平协和医院。7月“万宝山事件”和随之朝鲜排华事件发生后，他虽十分焦虑，却仍认为东北军无力与日军单独作战，故于7月6日密电东北政务委员会称：“此时如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方将对对我方要求割地偿款，东北将万劫不复，亟宜避免冲突，以公理为周旋。”可他同时又代表东北集团建议国民政府“对日采取强硬态度”，“直接抵抗日本侵略”。^⑤而醉心于“剿共”并已抛出“攘外应先安内”的蒋介石，虽集会讨论了张的建议，但否定了张的建议。张学良自易帜以来，对蒋介石忠心耿耿，不但遵从蒋的意旨，且在平息石友三的叛乱时，从东北调集精兵6万名入关，并未对即将动武的日本侵略做好军事准备。可是，关东军继而借口“中村大尉事件”，趁石友三叛乱之机策划在东北起事。张学良亟思回师抗敌，接连向蒋介石请命，明确提出“东北之安全，非藉武力无以确保”，并尖锐指出“日本推展其大陆政策，有急侵满蒙之意，已无疑”；他郑重建议：“事既关系满蒙存亡，吾人自应早为之计。”^⑥对此，蒋介石除重弹其“剿共”的老调外，毫无别的表示，

① 在宁粤对立中，1931年12月15日至1932年3月，蒋介石被迫下野。

② 《蒋总统秘录》第7册，“中央”日报社译印，1976，第185页；转引自解学诗《伪满洲国史新编》，人民出版社，2008，第122页。

③ 另有著述称，1933年5月6日，蒋介石在讲演中，将其观点定为“攘外必须先安内”。

④ [日]西村成雄：《东北的殖民地化与抗日救亡运动》，[日]池田诚编著《抗日战争与中国民众——中国的民族主义》，中国抗日战争纪念馆编研部译校（以下省略），求实出版社，1989，第46页。

⑤ 《顾维钧回忆录》第1册，中华书局，1983，第425页。

⑥ 毕万闻主编《张学良文集》第1册，新华出版社，1992，第466页。

并于1931年8月16日发出了众所公认的铣电：“无论日本军队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①自然，精于谍特谋略活动的日本侵略者对此了如指掌，中方官员对自方的态度与政策实际也不隐讳。^②因此，关东军于1931年9月中旬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虽因石友三叛乱很快被平息而未得有利条件，但是该事变确实是在东北军政首脑不在，后方空虚，并确知中国将不进行抵抗的有利时机发动的。

事实证明，九一八事变前，蒋介石不仅向张学良发出了上述铣电，而且于1931年9月11日曾亲自驱车到石家庄，电召张学良，在火车上面谕他万万不能抵抗。^③因此，当1931年9月18日晚10时，张学良正在前门一家戏院看京剧时，接到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的十万火急请示电报后，立即下令“不抵抗”“避免冲击”，尽管迄今亦未见到有蒋介石的命令文档公布。继而他还不止一次地向中外媒体宣传其不抵抗政策，甚至不顾许多东北军部队在不抵抗命令下达的情况下曾自发、自动、自觉进行激烈抵抗的事实，刻意强调不抵抗和未抵抗，其意图无非是欲与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一道表明：“中国只求世界舆论之判断，并希望公理之得伸。”^④特别是在1931年10月20日国联理事会做出第二次限期3周日军撤兵后，张学良竟欣然认为和平在即，日本快要撤军了。然而，日军不仅未撤，反而大举向黑龙江省进犯。是时张的不抵抗政策不得不略做调整，即颁令黑龙江省代主席马占山等“采取正当自卫办法”，但他仍对国联抱有幻想，要求“中央转报国联要求设法制止”，^⑤不过，未被制止反而得寸进尺的日军的疯狂侵略，终于使张学良开始感到“判断错误了”。^⑥特别是关东军打下齐齐哈尔后开始向辽西转进时，蒋、张的不抵抗政策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当时，辽西锦州

① 据张学良的原机要秘书田雨时在香港《明报月报》1991年9月号发表文章称：“‘铣电’一直藏诸秘档，当时在新闻检查制度下，凡报章刊载‘铣电’是要被删去或开天窗的。”

② 1931年8月17日，满铁木村理事致外务省亚洲局长电称：8月16日，东北政务委员会委员汤尔和去大连向满铁寻风摸底，曾称如果日军“强制进行，只有抱不抵抗主义”。

③ 此事在唐德刚、王书君《张学良世纪传奇》（口述实录，上卷，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第422~423页）一书和何柱国《九一八沈阳事变前后》（《文史资料选辑》第76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第66页）一文中，都有记载。蒋对张称：“日军在东北马上要动手……最主要的是要你严令东北全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

④ 《张学良文集》第1册，新华出版社，1992，第484页。

⑤ 《张学良致国民党中央党部等通电》（1931年11月6日），《张学良文集》，第515页。

⑥ 1990年6月和8月，张学良数次接见日本广播协会记者，曾称“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误了”，“没有把情形看明白”。